

南宋史稿

何忠礼

徐古军 著



政治・军事・文化

何忠礼 徐吉军 著

南宋史稿

责任编辑:吕凤棠

封面题字:张 浩

装帧设计:张 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宋史稿/何忠礼,徐吉军著. - 杭州:杭州大学出版社,
1999.4

ISBN 7-81035-486-8

I. 南… II. ①何… ②徐… III. 中国-古代史-南宋
IV. K2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2261 号

南宋史稿

(政治军事和文化编)

何忠礼 徐吉军 著

*

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邮编 310028)

*

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 8 插页 24.5 印张 610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1-2000

ISBN 7-81035-486-8/K·064

定价:45.00 元



宋高宗赵构像



南宋大内（彩塑画《南宋风情图》）



南宋官巷灯市和婚娶礼仪（彩塑画《南宋风情图》）



李纲像



宗泽像



南宋初年四将像(左起:岳飞、张俊、刘光世、韩世忠)



岳飞墓



岳飞庙



文天祥像



陆秀夫像



张世杰像



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大门



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门楼



朱熹像



马远《踏歌图》



夏圭《临流赋琴图》



刘松年《秋窗读易图》



李嵩《花篮图》



大足石刻之一——圆觉道场局部



大足石刻之二 —— 养鸡女



大足石刻之三 —— 如音珠观音像

序 言

徐 规

两宋立国三百二十年(960~1279),其中,北宋一百六十七年,南宋一百五十三年,刚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,是隋、唐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。

但是,两宋与隋、唐有着很大的差异,它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已经大为完善,门阀势力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,随着察举制度残余的进一步消灭,科举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,官僚政治最终代替了以往的门阀政治。军事上,压抑武人,实施领兵权和调兵权相分离的原则。推行募兵制度,“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,刺以为兵,连营以居之,什伍相制,束以军法。厚禄其长,使自爱重。付以生杀,寓威于阶级之间,使不得动”(朱弁《曲洧旧闻》卷九)。基本上解除了武人势力对政权的干预和威胁。在经济上,不立田制,不抑兼并,发展租佃关系,地主经济获得了大发展。特别到了南宋,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放松,手工业生产获得了显著的进步,城市日趋繁荣,实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先河。在思想文化上,主要表现为汉、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,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《五经正义》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了怀疑,群儒奋起,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,逐渐形成了以理学为主的宋学,进而确立了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的统治地位。另一方面,由于推行“右文”政策,并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,文学艺术日臻繁荣,史学和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。

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,日本学者对唐、宋社会的这种变化已经有了认识。1922年,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(湖南)发表了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》一文,提出了所谓宋代“近世说”的主张。内藤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:古代(先秦到东汉中期)——中世(魏、晋到唐中期)——近世(宋、元为近世前期,明、清为近世后期)三个发展阶段。他对宋代近世说规定的基准是: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君主独裁政治的确立;平民文化的昌盛;庶民地位的提高。他认为,这种与近世社会一样的现象,至宋代才开始出现(内藤之文收入《内藤湖南全集》,筑摩书房1969年版)。到了1947年,日本的另一位学者、东京大学的前田直典教授发表了《东亚古代的结束》一文,文章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:古代(唐以前)——中世(宋、元)——近世(明、清)三个发展时期,并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,对当时中国、朝鲜、日本三国的社会变动作了比较研究,批判宋代“近世说”,提出了宋代“中世说”的主张(前田之文收入《元朝史的研究》,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版)。上述两派尽管在对两宋时期的区分上出现了严重的对立,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,即都认为唐、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革。

与此同时,中国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。1939年,钱穆先生出版了《国史大纲》一书,他在书中说:唐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有两个绝大的变化:其一是中国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南移;其二是社会上贵族门第逐渐衰落。对于后者,他提出宋代社会有三个新现象:一是学术文化的传播更加普及,以前只是掌握在几个大家族手中。二是政治权力解放得更加彻底,出现了“白衣卿相”的局面。三是社会阶级更加消融。以前士庶区分极严,重家世门第。中外学者的这些观点和看法,虽然并不十分全面,表述上也欠确切,但他们都敏锐地觉察到宋代与以前社会有很大不同,从而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。

如果说,从宋代社会的特点中,看到了唐、宋的区别,是一种顺

向性的比较的话,还有一种逆向性的比较,也证明了这一点,这就是宋代对近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,是远非唐以前的社会所可比拟的。对此,近人严复从政治史的角度扼要地论述了这一点,他说:“古人好读前四史,亦以其文字耳!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,则赵宋一代历史,最宜究心。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,为善为恶,姑不具论,而为宋人之所造就,什八九可断言也。”(《学衡》第13期《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》三九)由此可见,唐、宋历史确实具有重大区别,深入开展宋代史的研究,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南宋和北宋相比较,帝王世系一脉相承,政策制度大抵雷同,社会矛盾也基本一致,只是将都城从开封府迁到了临安府,领土面积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而已。因此它无疑是北宋的继续,东汉、西汉实际上是两个朝代,故“两宋”与“两汉”不能同日而语。当然,南宋和北宋又具有重大的区别和不同:从政治上说,南宋出现了前后长达七十年之久的权相政治,帝王大多暗弱无能,少有作为,这种情况在北宋基本上没有出现。从军事上说,南宋在金朝和蒙(元)的频频打击下,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屈辱和约,领土日削月损,苟延残喘,直至亡国。而北宋到了后期,虽然骨子里腐败日甚,很难救药,表面上却依然保持强大,直至突然灭亡。从经济上说,我国的经济重心从南宋起已经最终地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。从文化上说,靖康之变以后,随着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,南北文化进一步交融,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,使我国的封建文化进入到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。另一方面,随着理学在思想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以后,一个从北宋中期以来,在忠君爱国、挽救社会危机的前提下,各学派自由争鸣、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的时代宣告结束,学术争鸣再次走向低谷。

以往两宋史的研究者多将重点放在北宋,或者厚北宋而薄南宋,这固然有着南宋史料不足(特别是最后五十年)、典章制度大致

相类似的具体原因,但也存在着轻视南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倾向。如果我们对南宋历史稍作一点深入的分析和研究,就会发现,南宋积贫积弱的程度尽管比北宋要深刻得多,南宋面临的民族危机也比北宋要严峻得多,但它的统治却坚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,既超过了曾经灭亡北宋的金朝,也为后来灭亡它的元朝所不及,个中原因足以发人深省。如果从明、清以降的政治体制、经济发展模式、思想文化、民俗风情,直至民族心理的形成等各个方面来看,南宋对后世的影响,实在大大地超过了北宋。因此,轻视南宋历史,仅仅看到它的黑暗面,或以北宋史的研究来代替南宋史的研究,都是不妥当的。

在学术日趋昌盛的今天,为了正确地阐述南宋的历史,揭示南宋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它对后世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,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,编写一部规模较大、论述较为完备的南宋史,已显得十分必要。

那么如何撰写好包括南宋史在内的历史呢?我认为首先是要不怕辛苦地和极其仔细地去积累史料,爬梳史料,鉴别史料,以决定史料的取舍,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下,发现、研究和分析问题,去正确地阐述历史。与此同时,还要有良好的史德,这就是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家刚正不阿、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,决不能图名利、赶浪头、走捷径,或人云亦云,或哗众取宠,或仰人鼻息。但秉笔直书又谈何容易,在封建社会里,统治者的高压政策,御用史学家的媚笔和曲笔,为尊者讳、为亲者讳、为贤者讳的传统说教,往往将历史写得面目全非,固不足论。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近二十年里,尤其是在“文革”期间,由于受到“左”的思潮影响,强调历史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,提倡开展学术领域的“阶级斗争”,从而出现了不少违心之作和“批判”文章,又把史学研究引入歧途。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叶适曾说:“不深于古,无以见后;不监于后,无以明前。”(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一九)

说明吸取历史的教训是何等的重要！

自改革开放以来,通过拨乱反正,在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,终于迎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,史学园地上也是满园春色,一部部有特色、有新意的史学著作的问世,一篇篇高质量史学论文的发表就是明证。在这样的形势下,以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何忠礼教授为主,有徐吉军副研究员等学者参加撰写的《南宋史稿》(政治军事编和文化编),经过五年多的辛勤耕耘,终于付梓了,这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又一个新成果,它填补了专门研究南宋历史的著作这一空白,值得高兴和庆贺。

综观本书,有一些突出的优点,主要是能够在正确史观的指导下,严格以史实为根据,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对事关南宋历史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进行新的探讨和论述,既不标新立异,也不落入俗套,因循旧说。

如在和战问题上,以往史家常常是无条件地赞美抗战,反对妥协,把一切主张妥协的人都归入到投降派的行列。本书作者却认为,对提出妥协的人必须作具体分析,如果在敌强我弱,或强弱相当的形势下,为争取喘息时间,与敌人作些妥协,以为后图,亦未尝不可,他们实质上与真正的抗战派并无两样。从历史上看,绝大多数和议的签订,都是双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,一旦这种平衡局面遭到破坏,要继续维持和议就不可能,即使“绍兴和议”也不例外。那种以为绍兴前期南宋有力量收复中原的看法,这是对宋、金的国情缺乏正确了解的缘故。“绍兴和议”给南宋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不难想象,但是它使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,为南宋政权的休养生息、积蓄力量、报仇复国赢得了时间,在客观上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。因此,后人谴责宋高宗、秦桧集团签订“绍兴和议”,主要不在于签订和议的本身,而在于他们签订和议的目的只是为了偏安江南一隅,甘为金朝臣属,以及后来他们所执行的一系列迫害抗战派、文恬武嬉、不思恢复的反动政策,遂使以巨

大代价换来的一点积极作用,丧失殆尽。我认为这一观点和看法是完全正确的,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。

再如提起南宋末年贾似道所推行的“公田法”,史学界几乎一致对它持批判的态度。而本书认为,推行“公田法”的主观意愿并不坏,但它首先使江南地主阶级受到损害,势必招致他们的猛烈攻击,后人根据这部分士大夫的记载,来全面否定“公田法”,是有失偏颇的。实际上,“早在贾似道推行公田法之前,这项措施无论从理论到实践,都已经处于萌芽之中,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,并不是贾似道凭空想象得出来的,也不能因为政治腐败而执行得不好,就对公田法作出全面的否定”。这样的分析和评述,公正而客观,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在对历史人物的评述上,虽然大家都同意“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”的观点,但真正应用到具体人物时,却很难做到,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人为拔高或贬低,可谓屡见不鲜。本书作者已注意到了这一流弊,故在评价历史人物时,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既不为贤者讳,作锦上添花之笔,也不对反面人物采取否定一切、不及其余的态度。我们从书中有关对以岳飞为代表的南宋初年诸大将,特别是对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等权相事迹的介绍和功过的评述中,充分地看到了这一点,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突出优点。

在史料的运用方面,大抵翔实而精审,阐述的角度比较新颖,这在文化编中也有同样表现。另外,文化编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,不少方面已超出了通史所述范围,其对文化史的重视,是本书的一个特点。

要写出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,从立论是否正确,史料运用是否得当,文字是否通畅,直至遣词造句是否妥帖,都要反复推敲和修改才好。据南宋前期人沈作侂说,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晚年在一个寒冷的夜间,尝亲自修改平生所撰文稿,时过半夜,妻子薛夫人劝他道:“此已所作,安用再三阅?宁畏先生嗔邪?”欧阳修笑